

严羽集

陈定玉
辑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心
新
初
示

程
干
帆
題

陈定玉 辑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严 羽 集

陈定玉 辑校

责任编辑 孟庆锡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东方红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375印张 388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册

ISBN7-5348-1543-6/1.645

定价: 22.00元

序

徐中玉

南宋严羽(字仪卿、丹丘,号沧浪逋客)不但是我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卓越评论家,而且也是当时著名的一位爱国诗人。由于他的《沧浪诗话》对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因为对他的诗学观点究应如何理解与评价,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影响至今未衰,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地位,特别是作为一个难得的爱国诗人的地位,未免受到若干掩盖。甚至由于误解了他的诗学观点,说他的诗学观点“引导诗歌创作脱离现实”(《辞海》:严羽条),“造成诗歌评论中脱离现实的风气”(《辞海》:《沧浪诗话》条),所以对他诗歌创作中不仅没有脱离现实,而且还鲜明、强烈地表现了爱国热情、忧国伤时精神的宝贵内容,长期来几乎极少有人提及,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很不公平、科学的。

其实,和严羽同时而稍前的当时著名诗人戴复古(石屏)早就在其《论诗十绝》中以“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二语高度评价称许过严羽的诗作并扼要指出其突出的内容了。时人所称严羽“粹温中有奇气”,这奇气我认为主要就是指他有不同于流俗,对时弊痛心疾首,欲图挽救却又壮志难申的愤慨不平之气,同时也指他对诗歌艺术有自己的创新见解,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都

有坚持其理论的勇气。

我们试读他的这一些诗句：

少小尚奇节，无意缚珪组。远游江海间，登高屡怀古。前朝英雄事，约略皆可睹。……（《梦中作》）

负剑辞乡邑，弯弓赴国仇。……报主男儿事，焉论万户侯。（《从军行》）

连营当太白，吹角动胡天。何日匈奴灭，中原得晏然！（《出塞行》）

这些诗句约略可以看出他的志节、抱负、期望。

四方群盗苦未平，况闻中原多甲兵。百年仇耻幸已雪，何意复失东西京。呜呼机事难适至，成败君看岂天意。战骨连营漫不归，空流烈士中宵泪。（《四方行》）

我有三尺剑，悬瞻光陆离，剡钟不铄，切玉如泥，水断蛟龙陆剡犀，三军白首才一挥。惜哉挂壁无所施，使之补履不如锥。吾将抱愤诉玉帝，手持此剑天上飞。（《古剑行》）

男儿一片万古心，满世寥落无知音。……下悲世事及危乱，上话古昔穷兴亡。高歌未断唾壶缺，起视落日神飞扬。……（《惜别行赠冯熙之东归》）

我亦摧藏江海客，重气轻生无所惜。关河漂荡一身存，宇宙茫茫双鬓白。到处犹吟然诺心，平时错负纵横策。……（《剑歌行赠吴会卿》）

这些诗句约略可以感到他的忧国伤时，中心如焚，壮志未伸的怀抱。

进贤之冠兮高乎岌危，山玄之佩兮长乎陆离，苟非其道兮曷如蕙带而荷衣。尧舜邈其不逢兮，我之心其孰得而知？宁轻世肆志兮采商山之芝。与其突梯滑稽有口如饴据高位而自若，钧厚禄而无疑，则余有蹈东海而死耳，诚非吾之所忍为。（《放歌

行》)

嗟哉，指佞之草不复生，群奸睚眦纷纵横。大弓宝玉争窃取，岂惧鬼责并天刑。我欲乘云朝帝所，大叫天关排九虎。……
(《雷斧歌》)

戎马相逢日，那知复此间。客愁诗莫遣，世事酒相关。江上孤舟在，天隅两鬓斑。更将忧国泪，满袖送君还。(《三衢邂逅周月船论心数日临分赋此二首》其二)

这些诗句约略可以知道他在壮志不伸，忧怀难抒，满心悲愤的情况下，还是始终要保持高尚的品格，昂扬的斗志，和忧国的深情。

略举这些例子，可见戴复古前举两句对严羽绝非虚誉之辞，同时也可证明，严羽的诗歌创作不但并未脱离现实，而且同当时国事艰危的局势联系得多么紧密，表现出来的情志又是多么难能可贵。这类诗的数量，在现存严羽创作中所占的比例，远比一般诗人直接写到关怀国事、民生疾苦的为多。这些诗中有些诚然是仿古之作，但感情无疑仍是他自己的，不能说形式上有点仿古，感情上也在代古人立言。讨论严羽的论诗主张，无疑应该联系了他的诗作来一道研究，互相参证。为了要坐实他的诗论“脱离现实”，对他诗作“紧密结合现实”的事实或避而不谈，或以为“仿古”而抹煞了同他思想的关系，都不能算是郑重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严羽思想有截然不同的转变时期，不能设想他的诗作和诗论在对待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会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作为一个饱经忧患，奔走江湖多年，想一展救国宏图，虽壮志未伸却始终不改其忧国伤时之志的严羽爱国诗作，我认为在今后的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个足够重要的地位。

二

《沧浪诗话》和所附《答吴景仙书》是现存严羽论诗的名著。他的

这些著作现在国外也已很有影响。但对他论诗的见解，古人间固有很大的分歧，今人间也依然有类似的情况，理解亦仍存在各种歧异。这不足为怪，经过共同的探讨和比较，反而很有益处。有些分歧之点，随着事实的澄清和观念的改变，事实上已渐渐接近或趋向一致。严羽的诗学观点虽大都可以找到它的渊源，但他针对当时许多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以及种种形式主义的弊端，总结过去经验，提出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旗帜鲜明、坚决捍卫诗歌的艺术规律，他的主张基本上是合理的，有些地方虽不无过分之处，却有其较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如果不是论其大体，吹毛求疵，当然可以找出其中不少缺点；如论其大体，则在古代诗论著作中，他的《沧浪诗话》确实是一部有系统、有特色、有勇气、有很多科学价值的大作。

《辞海》在前述两条里都谈到了严羽论诗推崇盛唐，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反对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对苏轼、黄庭坚和江湖派的诗都表示不满，主张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提出了较有系统的诗歌理论。这些介绍不失平妥，虽然严羽对宋代王禹偁、杨亿、刘筠、盛度、欧阳修、梅尧臣等“近代之诗”并未认为都不足取，不过加上了“取其合于古人者”的条件。但接着所说的：严羽以禅喻诗，力主“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强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引导诗歌创作脱离现实这些论断，却是未必妥当的。这些意见就在解放后出版的文学史、批评史一类著作中多有，《辞海》两条不过是同意综述了这样的评价。

关于“以禅喻诗”，清人冯班已有专著指出严羽对禅学其实所知未精，但严羽是在论诗，不过以其所知的一点禅理来作比喻，并不是要专论禅学，而比喻总是取其一枝一节的，其本意无非只是要强调“妙悟”对诗道的重要。在这里，我们应该重在论究其强调“妙悟”的当否，“妙悟”既属借喻之辞，就不可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禅学的唯心

主义或不可知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严羽其实不这样借喻也未必不能说得明白清楚一些，对他的本意，我们还是可以领会的。这些借喻上的问题，我认为同“引导诗歌创作脱离现实”并无必然的关系。严羽提出了这一主张，如上所述，他的诗作并未脱离现实。后来接受了他的诗学主张的人，也未都脱离现实。不能把后来有人脱离现实归咎于他重视了诗歌艺术的特点。

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加上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及严羽著作本身的研究都存在粗疏片面之处，对严羽诗歌理论还有远比《辞海》所说更不实事求是的，如说什么脱离生活甚至脱离理性啦；像禅宗修道一样去追求那种空洞玄虚的妙悟，作诗有成就，只消妙悟就行了啦；把诗歌导入唯心主义、复古主义的一条路向，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啦；只从艺术上着眼，并不顾及内容啦；等等。我不赞成这些看法，因为觉得这都与实际不合，至少距离很大。

严羽诗论着重提出的确是诗歌艺术的特点问题。我们评价他的诗论，不能离开了这一点，苛求他像写一本“文学概论”或“诗歌概论”一样，面面俱到地涉及一切问题。而且在评价他的诗论时，不但要联系他现存所有的诗论著作，也应参证他的诗作，以及可以说明他诗论倾向的一切材料，例如当时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同时人对他的评论，等等。而过去的一些非议，看来不仅没有顾及后者，甚至就连《沧浪诗话》中有机构成的几个部分，往往也并未顾及，而只是孤立地抓住几句话还未吃透他的本意就匆忙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例如：严羽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了“学诗者以识为主”的，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他多次表明最推尊李白杜甫，要“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他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他

还举例说,“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论诗“以识为主”,以李杜为宗,且特标举李杜的这些诗篇作为进一步的说明,怎么能说他的诗论是并不顾及内容、脱离现实的呢?

例如:他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又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他不过是主张诗应讲究意兴,有诗味,能够使人一唱三叹,玩味无穷,何尝反对理性?怎能说他脱离理性呢?难道前举李、杜诗篇的意兴中没有理性?他又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里虽未明言,可以看出他对好诗与生活体验具有密切关系是有所认识的。无疑他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很明确的认识,因而不少地方非常强调熟读古人的优秀作品。这是他的一种局限。不过我也不认为强调读书一定与体验生活没有关系。优秀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包括诗人自身在内的客观世界,人们不可能事事都去亲身经历一番,书籍也是增加社会生活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不能说提倡多读古人好书一定就是复古主义,就是完全脱离生活。能说严羽便是一个脱离生活的人?

例如:他虽主张学诗者要以李杜二集如治经那样去学,可是他并不主张只读这两家之集便足够了,还主张“博取盛唐名家”,“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并上推到楚词,兼及当代各家包括“本朝苏黄以下诸家”在内,加以比较。单读熟还不够,还要在自己胸中“熟参”、“酝酿”一番,久之才能自然悟入。他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熟读本身不是目的,也不能因此就写出好诗,最后要落实到有了“自然悟入”、“自得之妙”、

得了“集大成”之益，才会有大的长进。这个功夫并不“空洞玄虚”，倒是相当实在，怎能说他是主张只要一昧去追求空洞玄虚的妙悟就可写出好诗来呢？

再如：他谈的“妙悟”是否真很“空洞玄虚”？文字果然有点把握不定，这算不了大问题。他是把“妙悟”作为“诗道”，即诗歌艺术的特点或规律提出的。缺乏这种诗道，不合诗的规律，就不能算诗了，“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而若要写诗，真是诗，即“须是本色，须是当行”。究竟什么是“妙悟”？我认为它主要不过是说诗应具有能令人自悟其深情妙理的艺术特点，而不能一味直露地说教。诗要作到这一点，就应创造出一种足以令人产生这种悟解的形象，意境。这样的诗才是真诗。在“吟咏情性”的基础上，简要说，就是应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虽“无迹可求”，然而深情妙理即寓在里面，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使人一唱而三叹。他不赞成以文字、才学、议论写成的诗，但亦并未说过这类诗全无是处，“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就是说，这类诗在他看来充其量只能列入次等，不能称为上等之作。这番道理，其实我们至今岂非还在强调，并不怪诞，不过说法有了改变而已。宋代历史情况不同，喜发议论的诗不少，其中也有些既富哲理又有兴趣的好诗，不能以过去经验简单框定后代的诗作，严羽之说在这里不够全面是事实，但他坚持这种诗道，既不神秘玄虚，也非空洞无物，实无可厚非。他此外讲到的“兴趣”、“兴致”，我以为同“意兴”、“诗味”差不多，而其基础则都在“妙悟”。他决心捍卫这种诗道，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其实他也说过：“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又说：“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可见他并未绝对地以盛唐为限，虽有所主，而

通达灵活之处仍在。他反复说学诗者应博览广参，主于盛唐并未局限于盛唐，不过大体来说，总觉盛唐人诗中体现“诗道”最充分，所以才特别推崇盛唐。他这种主张，我认为基本符合实际，也已为后代广大读者的接受所证明。

三

“妙悟”既不过指诗歌艺术的特点，凡具有这一特点的便算得上是诗，因此主于“妙悟”就不会等于严羽只赞成某种风格的诗。前人就有严羽阳尊李杜，阴主王孟之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严羽反复推崇李杜，无论从他自己的言论和著作来看，都有真凭实据。后来王渔洋一面深爱严羽之论，另一面所作多近王孟一路，如何解释这里不谈，但这是王渔洋的问题，不能记到严羽的帐上去。严羽确是尊奉李杜为宗的，但如前所说，他同时主张应该博读广参，并没说过李杜以外即无好诗，一定都得同于李、杜的诗风。他说：“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他并未把这九种不同的风格再分高下。他又说：“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也未把二者再分高下。他所谓“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没有说过某一品的诗才能入神，当指无论哪一品的诗都可能入神，虽然“入神”很难。他说李、杜之诗是达到了“入神”的高境的，无非表明李、杜之诗特好，不是说必须遵循了他们的诗风才能入神。“他人得之盖寡也”，他人自然是指同李杜诗风有异的诗人，由于各种因素比不上李杜高明，所以得之甚少。“寡”不等于没有，或不可能。对王孟诗派，按上述原则，他当然也可以爱好。“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他公开称赞孟浩然的诗，并非阴主，所以称赞就因孟浩然的诗比韩愈远具有诗歌艺术的特点。他在坚持“妙悟”这一“诗道”的原则下，岂非还说过“玉川之

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吗？他又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都足证明他只在坚持“诗道”，对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好诗都兼容并包的。诗道广大，他有“多样化”的识见，符合诗歌发展的要求。

今人有层次之说，比起囫囵吞枣、含糊笼统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很有必要，可使析理变得精密。严羽论妙悟，也有类似的区分。如说“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不是有则全有，有了便无区别。他认为透彻之悟属第一等，其“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这就为评价作品拉开了档次，得以区别不同的成就，鼓励作者去争取达到第一义的悟境。这就是他评诗的主要标准。就诗歌而言，如果它根本不成其为诗，别的就都可不说了。文艺批评只能是对文艺进行的批评。显然他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论者，更不是“政治标准唯一”论者。这对我们也有不小的启发。

严羽论诗，对依样画葫芦、拘守声韵呆板规定、无病呻吟、游戏文字之类缺乏真情实感，没有内心要求等形式主义的做法非常反感。前已谈到，他盛称杜甫诗有“自得之妙”，能集前人之大成。他对东坡、山谷的“自出己意以为诗”有所不满，但不满乃在其“唐人之风变矣”，而不在其能“自出己意”的精神。当然，他笼统说东坡、山谷之诗都不合诗道，亦欠公允，没有看到北宋当时客观上普遍存在议论时政的社会背景与现实要求，对理趣诗也可以是合乎诗道的好诗，缺乏全面的理解。东坡、山谷也好，尤其对整个宋诗，都应该有具体分析的态度，应该看到其中有所发展、创新的地方。他对那些“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的诗作，固有很大反感，对“建除、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硬凑成篇，“只成戏谑”的东西，亦以为“不足法也”。他说“和韵最害人诗”，即因此类诗作，应酬随和，往往是无话找点话说，

绝非“不得已而言”。他这意见的根本立足点即在“诗者，吟咏情性也”，没有情性的说教或戏谑、逞学之作便不是诗。他反对形式主义诗风的理论依据在此。诗应吟咏情性，虽非他的创见，但这时他再“明目张胆”地提出来，面对的是势力还颇强大的江西诗派末流许多人的反抗，不仅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在那样危急的时代，人们难道不应有“忧国伤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为什么不去着力写出些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关切国计民生的作品来？我们不难体会到存在于他这种理论见解背后的社会需要，他决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为诗歌而诗歌”，只看重艺术特点却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人。他反对“叫噪怒张”，“殆以骂詈为诗”，这还是从诗歌艺术规律“妙悟”角度来谈的，并不是一律反对表现愤慨的感情。他所举杜甫《北征》等固可为证，他还说过“学诗先除五俗”，第二俗指“俗意”，陶明潜《诗说杂议》为之解释：“‘俗意’者何？善颂善祷，能谀能谐，毫无超逸之志是也”。我认为这样解释不差。但严羽也说过以“叫噪怒张”和“骂詈”为诗“殊乖忠厚之风”，就有点离开诗歌艺术特点来说话的道德说教味道，就不免成为其局限的一种表现。“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如老讲“忠厚”，历史上许多名篇就产生不出了。

应该承认，严羽是一个很有理论勇气的人。他敢于对苏、黄诸大家的诗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指责江西派末流的显著弊病，敢于对王安石的《百家诗选》公然表示不满：“今人但以荆公所选，敛衽而莫敢议，可叹也”，而且对其长辈出继叔吴景仙也直言指出所见不合处，毫无保留，甚至还说“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跟未点地处”，都不容易。他对自己的所见，非常自信：“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他知道他这种主张“诚惊世绝俗之谈”，会“获罪于世之君子”，但只要认为事实确是如此，别人的反对意见尚不能说服他，他仍断然自信乃“至当归一之论”。因

为这“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景仙劝他“毋直致褒贬”，他却回答：“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在我国文艺批评史上，刘勰是“不苟同异”的先锋，旗帜鲜明到一点也不想为自己留什么余地，谈吐锋芒毕露，严羽确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如果他确是既僭又妄，这种态度当然不值效法。问题乃在他所坚持的诗道，确有道理，大醇而小疵，他有这种不平凡的勇气，就值得称道了。当然他的自信也或有过甚处，如他且以为“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否？”意谓在这种情况下，他亦能完全答对准确。他识力甚高是可信的，是否真能作到这样准确，不能使人无疑。还有如：“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题引一般很短，后代之诗尽多与唐人命题非常接近甚至还有相同的，怎能保证“望其题引”就无误地断定唐人或今人？又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这些话就大可商榷了：己诗同古人之诗同具诗歌艺术特点固是一善，在其他方面仍有个诗人的“我”在，不可能尽同于古人，而且何必要求尽同于古人呢？这同他正确地主张的“诗者，吟咏情性也”，“诗有九品”，赞许“自得之妙”诸说，未免有点矛盾了。这方面他的确并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不过总的说来，他的博学熟参，实证实悟、不怕名人权威的声势，不因尊长之见而畏缩其辞，敢于探索，敢于立异，以捍卫诗道为己任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赞赏、学习的。我们现在多么需要大大鼓励、发扬严羽的这种理论勇气！

四

定玉同志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撰成的《严羽集》即将出版，我非常

高兴。这是很有意义、有重要价值的工作。对《沧浪诗话》，他利用一般不易得见的本子共十一种进行互校，而且异文全部出校。除《沧浪诗话》外，《沧浪吟》也一并利用十二个本子互校。此外他还附录了不少各本的序跋等研究资料，经他这番努力，这部书就是现存严羽作品最完整、完善的本子了。严羽的作品从此得以普及于广大读者，对严羽诗论诗作的研究，也提供了极为需要的材料。过去有些同志所以研究其诗论时没有同他的诗作参证，一个原因就在《沧浪诗话》易得，《沧浪吟》却比较难见。这部书的出版，无疑会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

严羽生前究有多少著作？至今还未搞清楚。可以断言的，是决不止现存这两种，一定还有很多，或已亡佚，或有所存留而尚未发现。在《庐陵客馆雨霁登楼言怀寄友》诗中，他自言“徒事百卷文，未返一竿钓”。至元庚寅（1290）黄公绍为《沧浪吟卷》作序，说他所看到的《沧浪吟卷》，已是“盖仅有存者”，“犹存什一于千百”。后来朱震作《严羽传》时，也还提到此点：“先生辟地江楚，诗散逸为多，至元间邑人黄公绍搜存稿仅百三十余篇，为序而传之。”可见他的诗在至元间已大部散逸。

朱震传记中曾提及严羽的诗论，云：“论诗推盛唐，谓后之过高者多法汉魏而蔑视盛唐，不知诗之众体，至唐始备，唐之不能为汉魏，犹汉魏之不能为唐也。因言古制有可以行之三代而不可行于后世者，非三代之制不善也，时不同也，诗亦若是已耳。又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指妙悟为入门，取上乘为准则，评辨考证，种种诣极，至今谈诗者尚焉。”在这段话里，“又曰”以下，别才别趣之说，显然引自《沧浪诗话》原文，下面几句，是作者的简介。前面“论诗推盛唐”云云，看来属作者的夹引夹议，“因言”以下几句，疑似引的严羽原文，而原文今尚未发现。

明代王嗣夷《杜诗笺选旧序》中曾说“至评杜者，如严沧浪王弼辈，可谓十得其五，而夷考其所自作，十不得三。吾谓其未有真知己者，以此”。又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集录诸家论李之语，凡出《沧浪诗话》者，均注明出《沧浪诗话》，共七节，字句不异。独第三十四卷有一节，云“《古风》第四十四首不言弃绝，但言恩毕，得怨而不怒之意，欲言难言，而又不能无言。‘将何为’三字，无限深情”。其下却注的是“严沧浪评”。乾隆己卯王琦跋文中还说：“李诗全集之有评，自沧浪严氏始也。世人多尊尚之，然其批隙导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中华书局本）据此，严羽尚有评李评杜之作，两位王氏尚及见之。即便是假托严羽的作品，仍有寻找证实的必要。若是真作，就更有研究的价值了。

以上只是我偶然发现有关严羽佚文的一些线索，博学君子，发现的当会更多。这些材料，明清人都尚见到，很可能现尚存留于世间，至少尚或可见其片断部分。如能把严羽散逸之作多少再发现出一些来，应是多么令人高兴、切盼的事。

定玉同志已为这部书付出了很大的劳动，我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担当起搜集散逸的工作。以他的勤奋和严谨，相信他会在严羽诗论诗作研究各方面都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来的。

〔一〕我的《严羽诗论的进步性》一文（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抒说所见，这里不赘。

附记：

这篇序文还是1986年暑中写成的，已经10年了。总以为书就

会出版,没料到稿件发生过中途遗失的曲折,多年劳动几乎白费,总算仍能出版,还是幸事。《沧浪诗话》是一部很有特色、创见的诗学著作,但严羽的许多著作已失传。他的评诗意见虽有所流传,数量较少,真伪也难确定。对此,刘跃进同志曾著文略加析议(文见《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一期)。定玉同志所著《严羽及其著作考辨》当有新的发现,可惜至今尚未读到,因赴美在即,来不及看到了。定玉同志在原稿遗失之后重起炉灶写成此书,对沧浪诗学研究,是一大推动,无疑是严羽之学的功臣。严羽批评的现象,和他倡导的主张,都有其历史背景,或艺术规律的意义。过去几十年的讨论中,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尚多,我认为今后一定还会出现很多新的见解,是值得大家共同来钻研的。

徐中玉

1996年8月27日